

访谈

芒努斯·菲斯克修
余浩风

中国民主季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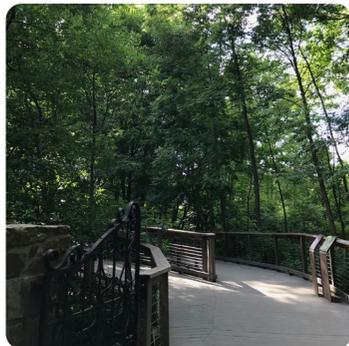
第2卷 第4期
2024年10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从帝国遗产到 DNA 政治：中国民族主义 与少数民族政策的 深层逻辑



芒努斯·菲斯克修



余浩风

编按：中国对少数民族的压制和同化政策，尤其是在新疆的灭绝性措施问题，已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通过强化“统一的中华民族”叙事，北京试图抹除少数民族的独立身份，DNA 研究成为其合法化手段之一。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历史叙事正在对国内外政策产生深远影响。那么，中国的民族政策如何影响其国际形象？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应如何回应？本刊编辑余浩风对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芒努斯·菲斯克修（Magnus Fiskesjö）进行了深入访谈，探讨了这些关键问题。

余浩风（以下简称余）：感谢你接受采访。你最近关于中国在新疆所实施暴行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深入分析引起了广泛关注。能否从你 2006 年的文章《拯救帝国》开始，谈谈它与你近期关于新疆研究的联系？¹

菲斯克修（以下简称菲）：早在撰写这篇文章时，我就注意到，曾在帝国时期被称为“蛮夷”的群体被重新定义为“少数民族”。自辛亥革命以来，

如何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一直存在未解决的问题。核心问题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应怎么对待这些少数民族的关系？他们应当拥有什么样的政治地位？

有些人主张仿效欧洲和日本的民族主义模式，即“一国一族”（one country one people），所有人统一在这一种身份下，而非拥有多元的身份。比如，孙中山最初希望中国仅属于汉族，但他不得不作出妥协，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后来共产主义者则希望仿效苏联模式，承认过去被视为“蛮夷”的群体为少数民族。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被俄罗斯帝国征服的少数民族被设立为自治共和国，并拥有脱离权。但中共掌权后，形式上也为新疆和西藏设立了自治区，但这些民族没有真正的脱离权。1950年代建立的制度至今形式上仍在沿用。如今在新疆的种族灭绝表明这一制度也正逐渐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统一”战略，类似于孙中山希望实现的“一国一族，不可例外”的国家模式。

2006年《拯救帝国》一文研究的是中共最初的承诺，强调所谓的少数民族其实属于被帝国所征服，应该予以独立建国，而非简单的自治。然而，中共后来放弃了这些承诺。这反映了帝国理念的延续性，以及这些帝国理念和结构如何持续影响并塑造今天的中国。

《拯救帝国》这个标题带有反讽之意，影射了我之前的老师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教授的著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² 他讨论了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如何推动全体中国人的统一，抹去了区域差异及区域历史差异等内容。

但他忽略了帝国遗产的延续问题，而且还陷入了“西方与其他”的二元思维模式，未能认识到中国的帝国遗产及其如何深刻影响并塑造了今天的中国。这些也正是我对他的批评。

西方世界常常陷入把世界划分为“西方与他者”的范式。忽视了历史上存在许多兴衰的帝国，不仅包括中国和俄罗斯、波斯、印度的莫卧儿王朝，甚至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关注的是：这些帝国是如何运作的？有哪些共同点？人们往往集中于近代由英帝国和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所主导的历史，忽视其他地方也有着悠久的帝国历史。

许多人将中国纳入“全球南方”，但这一分类并不准确。中国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之一，与“全球南方”其他国家有着显著不同。中国更像是一个复兴的帝国和经济中心，正在致力于主导全球。认识并理解这一历史模式对于阻止其重现至关重要。要实现真正的全球民主，首先必须消除帝国。

余：你提到中共起初反对帝国结构，但现在却继承了帝制中国的模式。请具体解释下什么是“帝制中国”？

菲：帝国是一种由统治阶层支配的政治经济结构，包含着多个不同的被强制同化的民族，并常常伴随着殖民主义等手段。中共自认为是推翻帝国的革命者，但后来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他们不再承认曾经承诺的西藏和台湾的独立，并想要抹去这些历史。如今他们转向了塑造“中华民族统一体”，要求所有人必须认同自己是中国人。³因此，我们看到了一次非常剧烈的意识形态转变。

这种转变在中国博物馆的历史呈现中尤为明显过去，博物馆里展示的青铜器以前被解读为统治阶级对被压迫阶层的剥削的象征，也会反映反抗皇权的历史。而如今，他们被呈现为中华文明永恒的结晶，彰显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创造力。自 1980 年代以来，中共过去对帝国主义是剥削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批判已经不复存在。

这种变化体现在官方话语和审查机制中。比如秦晖的《走出帝制》曾在 2013 年到 2015 年间通过审查，并在书店销售。但后来突然被下架。我将此解读为自 2012 年以来新政权不允许讨论当代中国仍存在的帝制结构的问题。事实上，秦晖的这本书并没有直接挑战现行体制，而是讨论了清朝末年的改革者希望摆脱帝制，创造出新的治理模式：如何制定宪法、推行法治，推行什么样的君主立宪制。这些问题对如今的体制仍具有现实意义：现在拥有什么样的体制？是否仍然生活在一个帝国之中？新的审查制度反映了政权对帝制态度的转变。很可惜，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我认为，这是过去十年中国政治转变中最重要的事之一。

余：在《中华秩序》一书中，王飞凌提出了“中华秩序”的概念，认为中国将自己定位为世界中心的等级结构，并宣称形成了一种世界帝国的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影响了国内的治理，也对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塑造了中国力量的一种独特形式，强调中央权威和文明的优越性。你对“帝制中国”的解读如何与王飞凌的“中华秩序”相比较？

菲：我认为王飞凌等人对“天下”和中国式世界秩序的讨论存在问题。他们的一个共同问题在于，拒绝将中国视为众多历史帝国之一。帝国的普世性和道德优越感并不仅限于中国，而是也是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古印

度等历史帝国的共同特征。

遗憾的是，这体现了中国民族主义思维，即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无法与其他文明进行比较，不应将中国放在全球历史的框架中讨论。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曾与一位中国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反对将中国皇帝与西方的“Emperors”相提并论，坚持皇帝的独特性和中国是不可比拟性。我不同意这种孤立的思维方式。尽管中国在某些方面确实独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与其他帝国进行比较。像奥斯曼帝国、罗马帝国都有各自的独特性，但依然可以通过比较来更好地理解这些历史现象。

余：你认为所有的帝王制度都存在某种可以加以比较的模式或体系。

菲：是的。比如，皇帝的言语就是法律，拥有绝对权力，统治者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种现象在中国和其他帝国都很常见。但我并不是否认中国式的皇权体制具有独特的方面，也应该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例如，当帝国瓦解或陷入混乱时，总会有人通过斗争来宣称自己为新皇帝。在中国，这通常伴随着天象征兆，天意会指引特定的人。这种传统在其他帝国并不相同。

余：根据简·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在《世界历史中的帝国》一书中的观点，帝国是扩张性的、等级化的结构，以不同方式治理多元化的人口，而民族国家则寻求同质化，创造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中共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似乎更像是一种民族国家建设。那么，你为什么认为中国仍在延续帝国的传统呢？

菲：关键在于帝国的扩张性。这是理解帝国运作方式的核心。帝国通过兼并和同化，将不属于其统治体系的民族纳入统一的政治框架，最终实现扩张。这一过程都伴随着同化。这种同化有时是强制的，有时较为缓慢，但目的始终是吸纳被征服的民族。

中国历史就是这种扩张模式的一个例子。长江以南曾居住着不同语言的民族，有些与汉族毫无关系，甚至有独特的语言文化，但如今这些大多已被同化为汉族。而如今，这些语言和文化大多已经消失了。学者们通过研究，试图寻找这些文化遗存。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时会出现一些特殊词汇，甚至会附带注释，说明这些词源自于曾经生活在南方的“异族人”。

在罗马帝国历史中也看到类似情况。凯撒征服高卢，将高卢语言和文化逐渐消灭，取而代之的是罗马文化和拉丁语。高卢作为一个独立身份消失，罗曼语族成为了统治力量。这种历史过程与中国的同化逻辑相似。在中国的历史中，扩张和同化的过程一直在持续。我曾写过一篇引以为傲的关于帝国背景的文章，⁴ 涉及到中文的术语“生蛮、熟蛮、生夷、熟夷”。“生”与“熟”这一对概念，主要用于晚期帝制时期，用来区分自生自灭、未受中国国家控制的“生”蛮夷，和已经受中国国家控制，强制纳税、被征召入帝国军队，被迫建造城墙等工程，但他们仍保留一些文化差异，仍然使用自己语言的“熟”蛮夷。

在我的分析中，“熟蛮夷”象征着被帝国同化的民族，他们逐渐失去原有的身份、语言和文化。这种同化过程显然还在进行中。“生”蛮夷则指尚未被征服、仍在帝国边界之外的民族。帝国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这些“蛮夷”。因为他们为帝国的军队、国家以及皇权的存在提供了存在的理由。

帝国本质上是永无止境的扩张体制，如果所有的“蛮夷”都被消灭或同化，帝国将寻找新的“蛮夷”，以维持这一扩张过程。这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明显。

对于这样的帝国，存在一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帝国按照扩张逻辑不断前进；尤其是在中国的例子中，帝国将自己描绘为仁政的中心，将“蛮夷”视为感激被纳入的群体。“归化”(returning)一词的使用尤为值得注意，“归”意味着“返回”，暗示这些民族本该属于帝国，征服后即被视为“归来”。可以将这种修辞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宣传策略。

他们将“蛮夷”描绘为自然归属于帝國的群体，若试图反抗，就会被战争征服。因此，帝国始终存在这样一个边界：一边是已经被征服并纳入帝國的“蛮夷”，另一边是未来可能被征服的“蛮夷”。只要帝国体制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继续存在，扩张的趋势就不会停止。

这是我对中国为何既是一个试图实现自身同质化的帝国，又同时具有扩张性的解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8世纪的台湾。平定台湾后，清朝内部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将台湾正式纳入帝国版图，另一派则警告过度扩张的风险，认为国家资源有限，建议将汉人撤回福建，放弃台湾。

最终，支持吞并的一派获胜，认为扩张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可以获得新领土和资源。台湾被纳入帝国版图。然而，清政府仍禁止汉族定居者深入原住民居住的山区。这被视为满族分而治之的策略，以确保整体控制并避免与原住民发生冲突。清政府甚至为此修筑了边界墙，限制定居者活动范围，原住民则被禁止进入平原区。这种行为可能反映了帝国希望保留部分“蛮夷”的愿望。政府常宣称：“你们必须信任皇帝，因为‘蛮夷’非常危险，

必须对他们进行控制。”保留一些尚未被同化或征服的“蛮夷”对帝国有利。清政府在 18、19 世纪允许原住民留在山区，或许正是为了保留这种正当性。

当今中国政府在谈论台湾时仍在使用“归还”或“回归”这样的词汇，就像“香港回归”一样。这与帝国时代描述“蛮夷”时的术语相同。翻译这个词很困难，因为它描述的是从未属于你的人，但你却声称他们理应属于你，因为他们“自然”地归属于你。怎么会有人不属于中国这个世界中心、仁政统治的中心呢？这种意识形态暗示，所有“蛮夷”都渴望成为帝国的一部分。“请统治我们，请接管我们”，这是帝国希望传达的形象。当然，确实有许多“蛮夷”会臣服，成为“熟蛮夷”。他们在这一过程中被“煮熟”，没有遭到屠杀，得以生存并最终逐渐被同化，失去原有的身份认同。因此，帝国的这一同化过程是缓慢而有序的。

相比之下，2017 年中共在新疆发动了非常严厉的强制同化运动。这与他们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相吻合。统一的目标意味着对不同民族的存在表现出公开的敌意。虽然在名义上，少数民族今天依然存在，但显然政府的目标是让他们首先成为“中国人”。他们可以保留一些象征性的身份特征，用于旅游等目的，但不再被允许拥有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存在，语言也应当逐渐消失，充其量被博物馆化。因此，这一趋势与先进的现代监控和治理技术密不可分。今天几乎无人能够逃避这种控制。

过去，人们可以逃到山里成为土匪，隐匿于“生蛮夷”的土地上，与帝国边界外的未征服者共存。这也解释了为何帝国会将拒绝服从统治的人犯罪化。一旦服从，就被称为“归化”，意味着“回归”了。然而，这种“回归”并非服从者的自我认知，他们只是为了生存下来。我们缺少这些人自述的记

录，但从帝国的视角来看，这一现象反复出现——帝国宣称本应属于它的人“回归”了，因为帝国自认为至善，所有人都应归属其中。

余：确实，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许多汉族人对于少数民族的认知有限，他们的社交圈主要也是汉族人。即使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仍然抱有汉族优越感，甚至表现出大汉沙文主义，认为汉族文明更先进，其他少数民族是“蛮夷”，需要被同化，接受汉族文化才能“文明”。

菲：很多人认为“我们就是中国”，是因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中华大地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没有争议的民族国家。因此，他们不会去质疑这些观点。这是过去一百年来学校教育的结果。

但有趣的是，研究显示，所谓的“战国”时期并不像后人描述的那样混乱。学者许田波 (Victoria Hui) 指出，这个时期更像是一个类似欧洲的国际体系，国家间虽有战争，但也有和平共存、互派使节的时刻。⁵ 比如齐国，与邻国和平相处，甚至修建了自己的长城来明确边界。这表明，战国时期并非一片混乱，而是多个文化相近的国家共同存在。其实，曾有一派希望回到周朝的秩序，即整个华夏地区保持名义上的最高王权，但各国依旧保持独立。然而，这一派的想法最终失败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后来，周朝的名义王权逐渐被边缘化，最终被废除，随之而来的是帝国的崛起。但胜利者却将战国描绘成充满混乱、绝望的无序的时代，强调帝国的统一带来了秩序。但这段历史的多样性早已被忽视。

余：的确，历史学家经常将这些故事浪漫化，使其看起来合情合理。

菲：是的，习近平最近的承德普宁寺访问就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例子。⁶ 这座寺庙实际上是乾隆皇帝为纪念在 18 世纪末对准噶尔人的“胜利征服”而建的。当时屠杀了数十万人，甚至多达 70 万。准噶尔人已灭绝，这场屠杀是历史上早期的种族灭绝案例。

习近平前往参拜时，寺庙特别策划了一个展览，主题是赞扬乾隆为确保国家统一所做的贡献。这就传递了一个信息：今天的中国和清朝的中国是同一个国家，都是围绕民族团结的理念。这种叙事表明，今天中共在新疆的做法，与 18 世纪乾隆在准噶尔所做的事情是一脉相承的。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场景，因为官媒完全隐瞒了屠杀真相。如果这场屠杀发生在今天，乾隆将被视为战犯，接受战争罪的审判。然而，官方只强调国家的统一。这种对关于国家统一的叙事和痴迷是极为强大的。许多人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的，当然需要国家的统一。但现在的这种“团结”概念，其实暗含着一个信息：不允许任何异议，不允许对历史有其他的叙述。所有关于帝国历史中不愉快的部分都被掩盖。这种对团结的定义和理解，可能是中国走向民主化的最大障碍。因为在这种叙事下，每个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如果有人提出异议或抱怨，就会受到“国家统一”的巨大压制。国家统一成为一种绝对的理由，所有人都被要求保持沉默。

余：在你看来，中国共产党目前回归帝国的延续性，是为了合法化其权威的战略举措，还是反映了党内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转变？

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答案是两者兼有。一方面，正如之前提到的，这是一种彻底的意识形态转变，回归了孙中山等人主张的“中国

为中国人所有”的统一的观念，不再提及满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特殊身份，认为这些民族要么融入，要么沉默。如今的中国正朝这一方向发展，这也是全球民族主义潮流的一部分，其核心是美化民族国家，这种趋势继承了欧洲历史上一些最糟糕的遗产。在中国，当帝国遗产与民族主义结合时，形成了一种极具破坏性的组合。

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宣传策略，旨在塑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国家，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种叙事隐含着一个信息：任何提出不同类型的政治体系、宪政或民主建议的人，都被视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敌人，需要被监控和压制。因此，大量的宣传资源被用于将中国描绘成一个“自然统一”的国家，以说服人们这种状态是天然的，而非人为的，是不可反驳和分析的。这一叙事非常有效，许多中国人甚至包括许多境外的外国人也接受了这一观念。这与遗忘帝国遗产和拒绝进行历史比较密切相关。

余：你的研究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对帝国延续性的认同及其对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通过操控古代 DNA 研究，这种叙述是如何影响我们对中国历史和民族多样性的理解的？在习近平政权下，这对像维吾尔和藏人有何影响？

菲：我最初开始涉足 DNA 和古代 DNA 的研究，是受邀为一本即将出版的书籍《古代 DNA 的关键视角》撰稿。⁷ 这是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正在全球不断拓展，研究时间跨度极为久远，能追溯到尼安德特人等远古人类的 DNA。早期的民族主义者没有这样的工具，但是现代的 DNA 研究开创了全新的局面。

过去，人们无法获取 DNA 信息，考古学也曾面临挑战。比如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文物的发现引发了对“前中国”居民身份的讨论。⁸ 新的基因数据就像 1920 年代意外发现的考古学证据一样，给传统叙述带来了新的挑战。

这种认知也对帝国的历史叙事构成了挑战，传统的单一的、不可质疑的帝国史观在 20 世纪受到了冲击。这种挑战也延伸至试图重新构建历史叙述的人们，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古代人群纳入今天想要重塑的中国历史之中？

在考古学领域，这一问题通过构建一种叙事来解决，声称古代人群是汉族的祖先，尽管这种叙述在某些方面显得尴尬且令人怀疑。今天的教科书往往将这段历史描绘为一条单一的血统线索，而实际上，五千年前根本不存在“中国”这个概念。在新的历史叙事中，各个古代不同的族群被“融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如今，DNA 研究提出了类似的挑战。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可以通过 DNA 追溯血统，这将对我们的理解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发现，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一些外国学者，都被“统一的中华民族主导东亚”的观念所迷惑。

古代并没有使用正确的地理术语来谈论东亚。谈论古代中国时也会避开如何扩展成为今天的广阔领土。如果解码新疆人的 DNA，会发现他们与中国东部的人的 DNA 并不完全相同。但一些学者主张中国人的 DNA 显示出一致性，最终汇聚成中华民族。这与早期考古学面临的挑战类似，DNA 被用来支撑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

相比之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 DNA 则被描绘为不连贯的，分裂的，碎

片化的，最终被中国人主宰。因此，新的 DNA 数据强化了考古学家构建的 20 世纪叙事，暗示不同血统最终不可避免地融合，最终汇聚成了所谓的中华民族，形成了今天的统一中国。

但对于维吾尔等民族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叙述，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自己被描绘为“不连贯”的。当然，他们也可能会被这种民族主义叙事所吸引，试图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 5000 年前。正如在中国，人们认为北京人生活在一百万年前，但却被描绘为中国人的祖先——这显然是荒谬的。然而，这种观念极具影响力，因为很多人坚信所谓的“科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这并不是科学，而是对科学数据的重构，以服务于民族主义叙事。不幸的是，全球范围内的人们都容易被这种叙事所迷惑。最近，蒙古发现了一座城市遗址，被证明为一个古代的维吾尔城市。⁹ 这一发现驳斥了几个月前中国官方的叙事，即新疆发现了一座具有佛教特征的古城，证明该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正是中国政府努力推广的历史叙述。¹⁰

如果你是维吾尔人，这种叙事无疑令人不安。现在，维吾尔人试图通过自己的历史发现来证明，他们的历史同样悠久，并曾是一个统一的民族，而不是支离破碎的。我认为这种民族主义话语的根本问题在于未能理解“民族”标签的本质：这些标签只是称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总在不断融合，创造新的标签，选择为自己定义新的身份。这是人类的基本特质之一。相反，忽视这一点导致了所谓中国民族的“自然存在”的误解。而这种“自然存在”是人为构建的。教育和宣传让人们相信它的真实性。

我们忽视了标签只是彼此施加的符号。比如，台湾著名学者王明珂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研究了今天青海和四川地区的小群体——羌族。¹¹ 他的研究揭示了关于羌族不是代代住在中国西部的民族，而是存在于华夏心中的一种对西部异族的概念。早在商朝的甲骨文中，羌族被描绘成一个长有角的形象，甚至被用于人祭，类似于“蛮夷”。王明珂的研究探讨了“羌”这一标签如何在历史上演变，由商代到汉代随着华夏的向西扩张，羌人的概念也不断向西推移。他的结论颠覆了传统关于羌族迁徙的说法，认为这些说法并无历史基础。

实际上，今天生活在四川和青海的“羌族”自称为尔玛 (Rma)，与古代羌族无关。“羌族”这一称谓只是随着中国帝国的扩张不断被贴在新群体上的标签。所谓的“羌族迁徙史”并不存在，转而在帝国历史以及帝国对边疆“蛮夷”不断进行重新命名和标签化来解释这些现象。

王明珂的研究贡献在于揭示了这一现象的复杂性。这类历史事实在中国的教科书中是找不到的，虽然中国学术界对此有讨论。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结合，暗示某些基因或文化比其他更优越。实际上，“汉族”的概念直到 19 世纪末才形成，是现代政治的产物。中国从欧洲借鉴了许多有害的思想，如民族主义和科学种族主义。

余：在当前主流的中文语境下，种族主义常常被视为西方的糟粕，尤其是美国的问题。这个词在中国被认为是一个“西化”的概念，在中国，人们只谈论“民族”而避而不谈“种族”。

菲：确实如此。但在清朝和早期民国时期，“种族”曾是首选的术语，直到“民

族”概念的提出，重新定义了少数民族，将过去被称为“蛮夷”的群体纳入现代体系。实际上，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民国时期如何重新给“蛮夷”贴标签，重塑少数民族的身份。¹² 1939年，因日本入侵，政府迁都重庆，遇到周边大量“蛮夷”，他们的名字常带有贬义的动物偏旁，比如“犬字旁”或“虫字旁”。这些民族学习汉语后，感到冒犯，认为自己被视为“半兽人”。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聘请人类学家芮逸夫 (Ruey Yih-fu) 调查“蛮族”的命名历史，并提出修正建议。芮逸夫的解决方案是将所有涉及这些民族的偏旁统一改为“人字旁”，从而将他们纳入国家的民族体系。1950年代共产党正式推行这一政策，去除了带有“虫字旁”的旧称谓。我在文章中特别致敬了芮逸夫的贡献，他的研究帮助现代中国承认少数民族的完整人性，这是一种进步。

我对这个研究非常感兴趣，为此我还特意去找了芮逸夫的原作。这些研究是在战时重庆印刷的，纸张质量非常差，几乎快要散架了。我希望他们能保存这些珍贵的资料，以防遗失。我自己也做了一些扫描。

余：中国对亚洲 DNA 研究的处理方式，如何强化了汉族优越性和历史连续性的叙事？这又如何影响了国内外政策，尤其是在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上？

菲：是的，我之前的研究指出，古代 DNA 研究往往支持一种叙事，暗示像维吾尔这样的少数民族身份脆弱、不连贯，最终不可持续。这种观念虽然在公开场合难以明确表述，但私下许多官员相信少数民族最终会消失，融入汉族文化，因为汉族文化优越。我曾与一些官员交谈时，他们坦率地承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将“自然”消亡。然而，我注意到习近平越来越

越多地采用一种科学主义的语言，特别是在谈到“国家的DNA”时。¹³这在我看来是非常荒谬甚至是疯狂的，因为国家并不像有机体那样拥有DNA。然而，极端民族主义者倾向于将国家视为有机体。因此今天许多官员可能会附和这种说法，认为其他民族拥有“劣质的DNA”，这些民族最终会因为不具备可持续性而逐渐消亡。

这种思维与美国历史中的“天命”观类似，认为印第安人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同样，现今的中国似乎在强化少数民族消亡的叙述。虽然过去中国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并给予有限的自治，但随着新政策和种族灭绝的实施，少数民族的身份正在被逐步抹除。因此，少数民族对此深感忧虑，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意味着他们的民族将不再被承认。

余：这是你对中国少数民族的预言吗？他们会在中共的统治下逐渐消失？

菲：消除维吾尔身份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当前进入了新疆种族灭绝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这是一次有意识的行动，成千上万的维吾尔儿童被带离家庭，送入全中文的学校。当他们毕业时，维吾尔文化、语言和宗教认同将被彻底抹除。这一进程残酷且具有系统性，但进展显著。然而，是否会彻底完成还有待观察。毕竟，文革期间也曾见证过对少数民族身份以及对整个国家文化的激进压制。江青曾极端反对少数民族，认为他们的存在是不必要的，属于资产阶级的胡言乱语。尽管当时少数民族经历了严酷的打压，但最终还是活了下来。虽然如今的全面监控与执法系统更加严密，似乎当前的形势比之前更加严峻，但仍可能有希望。

余：鉴于当前的全球局势，特别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你如何看待中

共的“帝国中国”的延续对国际姿态的影响？这种延续是否意味着中国在全球事务中会采取更具进攻性甚至是侵略性的立场，类似俄罗斯？你认为这种表现会有所不同吗？应该如何在当今地缘政治环境中理解“帝国中国”？

菲：不幸的是，我看到了很多相似之处。俄罗斯从未真正处理过其帝国遗产；这个遗产从未被彻底否定，反而在苏联时期被延续下来。这与中国相似——中国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复制并采用了斯大林对少数民族的政策。

如今，中俄两国都在坚持统一的民族主义立场，存在许多共性。比如，俄罗斯在占领乌克兰的地区，对儿童进行“再教育”，强迫他们忘记乌克兰语，只学习俄语。这与维吾尔儿童的境遇类似。我与一位维吾尔学者共同撰写了一份报告，揭示了数十万维吾尔儿童被强迫接受这种同化政策。¹⁴ 虽然俄罗斯暴行的规模不及新疆，但意识形态上，中俄都拒绝承认这些民族的独立性和差异性。这种模式在全球范围内似乎成为了一种趋势，令人非常不安。

这反映了全球历史的周期性。尽管国际社会自 19 世纪以来尝试通过国际法和行为准则来维护和平，取代民族主义的侵略思维和霸权观念，但这些努力屡次失败，尤其是在二战前希特勒退出国际联盟的情况下。如今，中俄成为了这些理念的反对者，回归了“强权即公理”的旧观念，认为强者可以凌驾于弱者，权力即正义。

他们试图传达的信息是：现实如此，无法逃避。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主义和帝国冲突曾主导某些历史时期，而我们可能正在回到那种状态，这令

人悲哀。我希望世界能意识到这一点，并坚守国际法，努力维护国际机构。而中国和俄罗斯则无视 1945 年后的历史。他们只关心“伟大的俄罗斯”和“伟大的中国”，认为自己有权告诉世界如何运作。如今，中俄试图主导全球框架，否认普遍人权，意图抛弃 1945 年联合国设立的基本原则。这一趋势对未来极具威胁。

当然，美国在无视国际规则方面也有责任，比如虐囚、绑架、侵略行为，这给中俄提供了借口：如果你能做，我们也能做。作为来自一个小国瑞典的公民，我深知国际法治的重要性，我们不想被抹去。这种情况对维吾尔人来说尤其危险，因为他们正面临民族消失的威胁。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曾经历过类似的强制俄化和身份压制。

余：在你看来，应如何防止这种局势恶化？历史似乎在重演，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逐渐显现。你认为在所谓的现实主义视角下，即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秩序中，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强化法治、民主和国际人权，以阻止这种悲剧性的未来发展？

菲：其他国家应以身作则。以一些国家在巴以冲突中的表现为例，过于片面地偏袒一方是虚伪的，公正对待这些问题很重要。我最近关注到美国内政部发布的一份关于印第安寄宿学校的报告，这些学校曾强迫成千上万的印第安儿童放弃语言和文化，报告结论显示这些行为是种族灭绝的一部分。¹⁵ 现在美国正讨论是否需要正式道歉并赔偿，内政部长是一位美洲印第安人。美国如果能够公开承认错误并道歉，将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

我认为，美国道歉不仅是道德责任，也为世界树立榜样。特别是中国，正

对维吾尔儿童实施类似政策，强迫他们放弃文化。这违反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如果美国公开道歉，将传递一个重要信息，即国家可以承认并改正错误。希望未来中国也能向维吾尔族道歉，虽然这可能不会很快发生。但我对未来抱有希望。

余：在你的分析中，你提到了中国正在抹除对帝国征服和不平等的批评。你认为这种抹除如何反映在当代中国的学术和政治话语中？这对中国民主化的前景意味着什么？

菲：我认为当代中国的官方民族主义对“统一”的强调是实现民主的主要障碍。这种理念不允许有异议，而民主的核心是接受不同意见的合法性，允许分歧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管理。民主制度允许投票，前提是承认异议的合法性。然而，在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话语中的“统一”实际上掩盖和抑制了异议的存在，强化了对不同声音的压制。

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后，许多人调侃他像皇帝，并通过表情包和视频表达讽刺。比如有人拍视频模拟倒车的场景，甚至有家庭模仿火车倒退的情景。这展示了中国人的创造力，但也引发了政府的强烈反应，甚至有人因此被拘捕。

如今，中国的表达自由的空间不断缩小。而这种对“统一”的强调，也在种族灭绝背后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对单一观点的强制要求，源于对异议的恐惧。而在民主国家，抗议和异议是常态，接受异议正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因为每个人的背景、经历和观点不同。因此，需要系统性的管理这些分歧以维持和平共处，而不是诉诸暴力或冲突。

对于民主化而言，接受异议是一个关键的前提。也许，幽默能够成为一种潜在的解决办法。因为幽默有时能够打破僵局，带来出其不意的效果。我曾翻译过一些苏联时期的笑话以鼓励中国人用类似的方式面对现实。虽然这些讽刺在 1980 年代短暂存在过，但后来消失了，可能是高层不满。我认为，领导人应学会接受批评和自嘲。

余：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中国集权体制，根植于其帝国历史，是否从根本上反对民主化的原则？

菲：是的，帝国体制与民主不兼容。美国也有类似的矛盾。当美国在全球以“反恐战争”的名义设立秘密监狱、使用无人机轰炸等行为违背了民主的透明性与言论自由，是一种屈从于帝国的本能。民主需要言论自由、信息公开，但他们在秘密监狱虐囚并试图掩盖。只有在媒体曝光后，问题才可能得到遏制，虽然这种现象至今依然存在。当国家开始秘密违法并试图掩盖时，民主就会走向衰退。

这是所有国家面临的挑战。在中国，作为一个威权国家，一切似乎都处于秘密之中，这表明了极大的恐惧。

余：我代表《中国民主季刊》再次感谢你接受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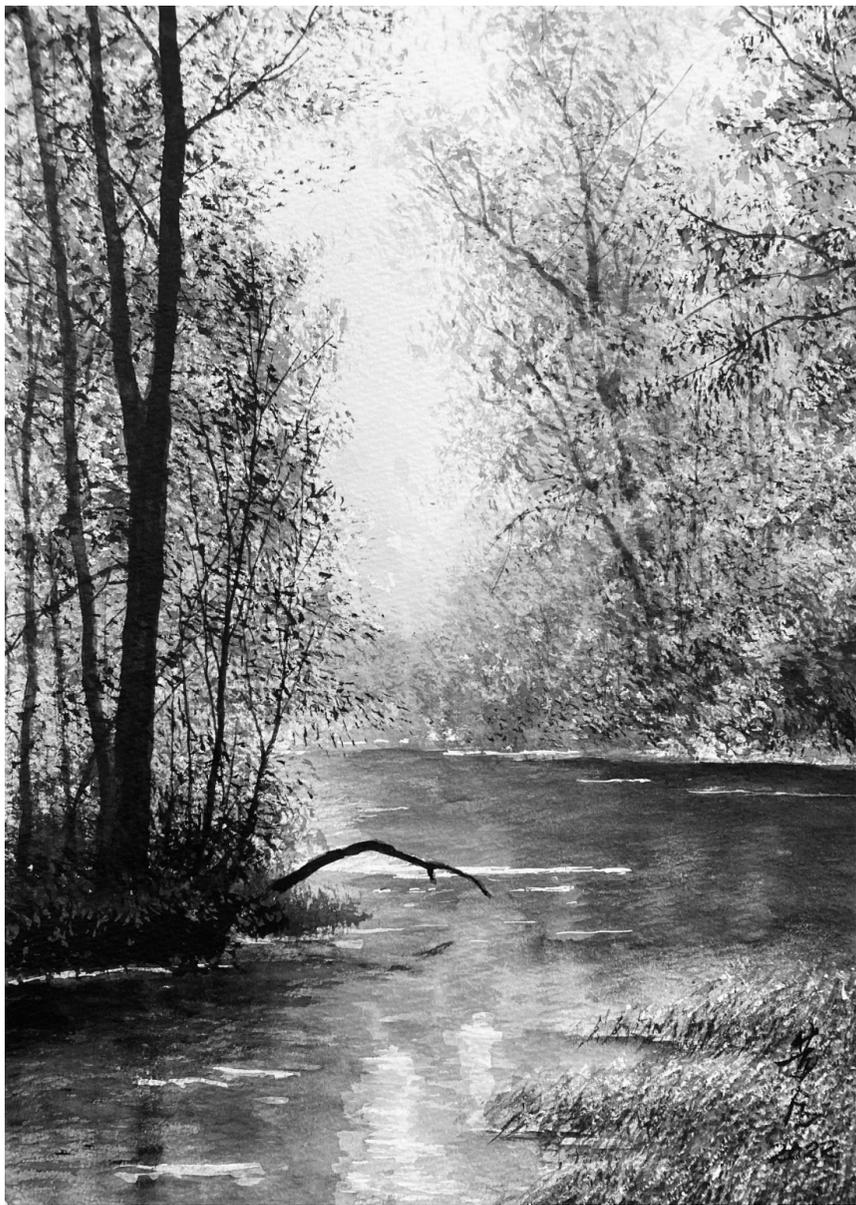
菲：谢谢。

（原访谈为英语，由余浩风整理翻译成中文）

注释

- 1 详见：菲斯克修：《拯救帝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国家建设》，《欧洲东亚研究杂志》。[Fiskesjö, M. (2006). Rescuing the Empire: Chinese Nation-build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5(1), 15–44. <https://doi.org/10.1163/157006106777998106>]
- 2 详见：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芝加哥大学出版社。[Duara, P. (1997).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3 关于对统一的执念，马思中教授推荐《第一和最后的皇帝》[Dean, K., & Massumi, B. (1992). *First & last emperors: The absolute state and the body of the despot*. Autonomedia] <https://autonomeia.org/product/first-last-emperors/>
- 4 详见：菲斯克修：《帝制中国的生蛮与熟蛮》，《亚洲内部》[Fiskesjö, M. (1999). On the ‘Raw’ and the ‘Cooked’ Barbarians of Imperial China. *Inner Asia*, 1(2), 139–168. <https://doi.org/10.1163/146481799793648004>]
- 5 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代早期欧洲战争与国家形成》，剑桥大学出版社。[Hui, V. T. (2005).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14545>]
- 6 关于习近平到普宁寺调研的报道，请详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0825/c1001-32207363.html>。马思中教授在采访中的解读，请详见：Gurung, L. (2021, August 31), 《普宁寺：习近平为何庆祝种族灭绝》 (*Puning Temple: Why Xi Jinping Celebrated a Genocide*). <https://bitterwinter.org/puning-temple-why-xi-jinping-celebrated-a-genocide/>
- 7 菲斯克修：《新民族主义中国的古代 DNA 与民族政治》(Ancient DNA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 Neo-Nationalist China)，选自《古代 DNA 的批判性视角》(*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ncient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ncient DNA*)，由 Daniel Strand、Anna Källén 和 Charlotte Mulcare 编辑。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24 年，第 145-66 页，开放获取 [第 7 章]：<https://direct.mit.edu/books/oa-edited-volume/5800/Critical-Perspectives-on-Ancient-DNA>
- 8 前中国的居民指的是四千至七千年前生活在中国北方的人们。
- 9 吉力力·喀什噶里：《考古学家在蒙古发掘出古代维吾尔城市的废墟》。这一发现正值中国试图将维吾尔历史重新塑造为自己的历史之际 (Jilil Kashgary, *Archaeologists unearth ruins of ancient Uyghur city in Mongolia*. The discovery comes at a time when China is trying to recast Uyghur history as its own. By Jilil Kashgary for RFA Uyghur. 2024.08.25.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archeologists-unearth-ruins-ancient-city-mongolia-08232024145743.html>)
- 10 中国数字时代：《丝绸之路的发掘有助于推进中国的地缘政治目标》，2024 年 7 月 31 日。(Silk Road Excavations Help Advance China’s Geopolitical Goals. *China Digital Times*, Jul 31, 2024.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24/07/silk-road-excavations-help-advance-chinas-geopolitical-goals/>)

- 11 详见：王明珂 (1997),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12 详见：菲斯克修 (2011), 《动物他者》。[*The Animal Other. Social Text*, 29(4), 57–79. <https://doi.org/10.1215/01642472-1416091>]
- 13 有关习近平对 DNA 的痴迷的详情，请参阅：<https://direct.mit.edu/books/oa-edited-volume/5800/Critical-Perspectives-on-Ancient-DNA>
- 14 关于此报告的详细内容，请参见：Fiskesjö, M., & Turdush, R. (2024), 《中国大规模拘留和强迫同化维吾尔族儿童》(Mass Detention and Forced Assimilation of Uyghur Children in China—Centre for East Turkistan National Interest), <https://cetni.org/?p=7053>
- 15 关于此报告的简要介绍，请详见：Carrillo, S. (2024, July 30), 《近千名儿童死于美国资助的印第安寄宿学校》(*Nearly a thousand children died at Indian boarding schools funded by the U.S. NPR*), <https://www.npr.org/2024/07/30/nx-s1-5051912/interior-dept-report-indian-boarding-schools>



黄奕信画作